

管 理 学 人 论 丛

丛书总策划/郭 毅

社会资本 与管理学

Social Capital and Management

:: 郭 毅 罗家德 // 主编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要 容 内

社会资本 与管理学

Social Capital and Management

主 编 郭 毅 罗家德 // 主 编

中 国 社 会 学 院 研 究 所 编

中 国 社 会 学 院 研 究 所 编

中 国 社 会 学 院 研 究 所 编

中 国 社 会 学 院 研 究 所 编

中 国 社 会 学 院 研 究 所 编

中 国 社 会 学 院 研 究 所 编

中 国 社 会 学 院 研 究 所 编

中 国 社 会 学 院 研 究 所 编

中 国 社 会 学 院 研 究 所 编

中 国 社 会 学 院 研 究 所 编

中 国 社 会 学 院 研 究 所 编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内 容 提 要

社会资本及其社会网分析是当代国际社会科学界的研究热点,近年来在管理学界受到了普遍的重视。本书收集了华人社会学者和管理学者的相关研究论文以及方法应用的文章,分别从概述篇、个体篇、中观篇、区域篇和方法篇五个方面讨论社会资本的性质和意义、在管理研究中的应用、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的本土化、经济活动中的人际交往、个体行为中的社会资本形成、个体行为的社会网、组织内和组织间的社会资本及其社会网、区域中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与社会网、个体网和整体网的介绍和应用。尤其对华人组织的行为与管理中的社会资本及其社会网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资本与管理学/郭毅,罗家德主编.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1

(管理学人论丛 丛书总策划郭毅)

ISBN 978-7-5628-2013-0

I. 社... II. ①郭... ②罗... III. ①社会资本—研究
②管理社会学—研究 IV. ①F014.39②C9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3472 号

管理学人论丛

丛书总策划/郭毅

社会资本与管理学 郭毅 罗家德 主编

Social Capital and Management

出版发行/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梅陇路 130 号,200237

电话:(021)64250306(营销部)

传真:(021)64252707

网址:www.hdlgpress.com.cn

印 刷/上海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 本/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25

字 数/462 千字

版 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1 月第 1 次

印 数/1—2 050 册

书 号/ISBN 978-7-5628-2013-0/F·163

定 价/3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出版社营销部调换)

丛书导言

“管理学人论丛”是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学科教师 and 海内外其他院校或专业人士多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果。该丛书以专著、研究报告集、教材、知识性读物等形式出现,它具有如下特点:

1. 反映当前国际管理学界的部分最新研究成果及其应用情况,尤其是在组织理论与组织行为、组织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与战略管理、服务运营管理、财务与会计、管理学研究方法论与研究方法等方面,其形式包括总述与评论、应用与发展等。

2. 反映中国管理现实中的状况与问题,比如,教学或研究所使用的案例、中国管理过程中的脉络与特性等。过去管理学界所提倡的“中国式管理”和当前管理学界所争论的“西方管理的‘技’与东方管理的‘道’”,都提出了一个极具挑战的课题,即如何在理论上演绎出符合中国人认知与行为习惯的理论框架。换言之,管理理论在中国的推广与开发同样有一个“组织认同”和“个人认同”的过程。

3. 针对管理类学科尤其是工商管理类学科的青年教师、博士生、硕士生,以及工商管理硕士的课程学习或者研究需要,确定相应的选题,以迎合管理类研究生学习知识或青年教师学术研究缺乏相应的参考书之需求。

4. 对于有兴趣了解和学习当代管理理论和方法的企业界人士和其他社会各界人士,本论丛中的知识性读物也能在知识性、方法性和趣味性方面提供相应的服务。管理理论是学者对现有社会与组织运作的洞察与思索,虽然与现实社会的实际运作有一段距离,但事实证明,它有助于使业界人士拓宽视野,转换思维,有所领悟,有所发展。

在本论丛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本校及外校各方面人士的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管理学人论丛”策划人 郭毅

2005年11月24日

前 言

弗朗西斯·福山指出：“社会资本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一个群体之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或准则。”社会资本，作为人类自身可以构建、调动和使用的关系性资源，对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科学界广泛的研究兴趣。同样，许多的研究也发现，社会资本也会以灰色、黑色的形态出现，对社会发展和进步产生阻碍作用。但无论如何，社会资本作为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产物，应当是一个非常值得社会科学工作者倾心探索的领域。

目前，社会资本研究所遇到的挑战是，其概念内涵的极度泛化和研究过程的随心所欲。因此，将社会网分析导入到社会资本的研究过程，可以减少或限制研究中的非科学成分。以格兰诺维特、林南、克瑞克哈特、博特等为代表的领军人物已经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在最近十年来，取得了许多极富贡献的学术成果。

社会资本及其社会网分析被引入到管理学界后，同样为管理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在国内管理学界，有关就业及寻求工作、民营企业及企业家、创业企业及创业家、高科技产业及其园区、产业集群及其区域发展、“关系”及华人管理模式、外包及企业间网络、组织行为及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成果不断涌现。

在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网专业委员会诸位同仁尤其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罗家德教授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自2000年开始涉足相关研究。2006年6月，在我校召开了“首届社会网与关系管理研讨会”，来自国内十多所高校的管理学院、社会学系的教师和博士生就社会资本、社会网分析与管理学研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本书选录了2000年以来我校教师、清华大学罗家德教授及其他专家的研究成果，其中，特意收集了我国台湾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张维安教授关于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的本土化研究、叶匡时等教授关于产业和企业中的社会资本及其社会网研究，这些成果对大陆学者的相关研究具有启迪作用。

本书将相关论文和研究报告分为概述篇、个体篇、中观篇、区域篇和方法篇。其中,概述篇涉及有关社会资本及其社会网分析、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的本土化研究等内容;个体篇涉及个体关系的构建及社会资源的利用;中观篇涉及组织间的相互关系中的社会网;区域篇则以产业集群及其区域发展为主;最后,为使初学者对社会网分析的有关方法有所了解,收录了刘军教授和罗家德教授介绍整体网和个体网的文章。

本书之所以能够出版,得到了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持。其中,罗家德教授的支持是最大的,他一直致力于将社会资本及其社会网分析导入到管理学研究中。编者自2001年与他相识后,2002年8月初,由罗教授牵线,在芝加哥希尔顿宾馆与社会资本研究的华人领军人物边燕杰教授、著名的社会资本研究学者阮丹青教授和陈介玄教授等见面。本书中我国台湾学者的论文也都是由罗家德教授出面联络的。此外,张文宏教授、刘军教授等也非常乐意由本书收录他们的文章。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的姚璿女士对本丛书的出版一直予以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 者

2006年10月

概述篇 发现与意义

1

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 张文宏 / 2

人际关系互动与社会结构网络化——社会资本理论的结构基础 郭 毅 朱扬帆 朱 熹 / 24

社会资本与管理学研究新进展——分析框架与应用述评 郭 毅 朱 熹 / 39

社会镶嵌与本土化研究——以关系网络与经济活动研究为例 张维安 / 51

经济行动与社会关系——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研究 潘美玲 张维安 / 66

个体篇 个体关系的构建与资源利用

85

日常经济生活中行动者的社会资本——求职的关系逻辑及管理学的创新途径 郭 毅 / 86

大学生择业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 郭 毅 顾 洁 / 101

社会资本的过程性与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研究的新范式 郭 毅 朱 熹 / 122

关系强度与企业家行为：嵌入的视角 尉建文 / 140

上海和新加坡现代商业社会中的“关系”比较研究 李乃和 刘 静 / 152

中观篇 镶嵌与结构：组织内与组织间的关系

173

制度转型下的中国商业网络结构 任 兵 / 174

以交易成本—镶嵌观点研究中国人的外包交易	罗家德
叶勇助 / 203	
网络视角的关系营销研究	王晓玉 / 230
企业组织之亲信角色与亲信关系	戚树诚 / 241
特殊信任与一般信任——中国组织的社会网分析	罗家德 / 262
区域篇 集群与创新网络	295
社会资本在聚群演进中的作用	封凯栋 薛 澜 沈群红 / 296
人际网络在信息产业中扮演的角色：以双湾关系为例	刘韵僊
叶匡时 王保铨 / 314	
方法篇 以个体网与整体网衡量社会资本	343
简析整体网研究	刘 军 / 344
以社会网方法衡量社会资本	赵延东 罗家德 / 369
本书作者简介	391

……概述篇 发现与意义



:: 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

张文宏

过去 20 年,“社会资本”是社会科学中最突出也是争议最多的概念和理论之一。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管理学家乃至历史学家纷纷使用这个概念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我们认为,社会资本理论的争论主要是由概念界定的不统一、测量方法的差异和分析层次的不同造成的。本文希望就以上各个方面澄清(而非解决)有关的争论和混乱,为以后社会资本的社会学研究理出一个清晰的思路。

一、社会资本概念的不同界定

(一) 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

当代对于社会资本概念的第一个系统的表述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他指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在这个词汇的多种意义上,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的‘信任状’。”(Bourdieu, 1986)

在把社会资本概念引入当代社会学语境的学者中,布迪厄的分析在理论上最为精练,但在后来的社会资本研究中,他的理论却被忽视,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的社会资本论著主要用法文出版,并湮没在其卷帙浩繁的社会学、教育学、文化学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中不无关系。布迪厄的概念本质上是工具性的。他关注的是个人通过参与群体活动不断增加的收益以及为了创造这种资源而对社会能力的精心建构。社会网络不是自然赋予的,必须通过投资于群体关系这种制度化的战略来建构,它是其他收益的可靠来源。布迪厄的定义清楚地表明,社会资本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社会关系本身,它使个人可以摄取(access to)被群体拥有的资源;另一部分是这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Portes, 1998)。布迪厄从阶级的观点出发,把社会资本视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和再生群体团结并保持群体的统治地位在相互认可和承

认时进行的成员身份投资。群体中的成员身份以排除局外人的清晰界限为基础(例如:贵族、头衔和家庭),因此,群体的封闭性和群体内部的密度是必需的。

布迪厄的分析重点在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及符号资本的相互转化。他认为,投资于社会关系的目的在于把自我的、私有的特殊利益转化为超功利的、集体的、公共的、合法的利益(Bourdieu, 1990)。因此,通过社会资本,行动者能够摄取经济资源,提高自己的文化资本,与制度化的机构建立密切的联系。社会资本的这种功效,特别可以在所有那些不同的个人从确实等价的经济和文化资本中获得非常不平等收益的情况下发现。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投资依赖于行动者可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规模,依赖于与他有关系的个人拥有的经济、文化和符号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所以,社会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预设了对社交活动的不间断的努力,这意味着时间和精力的投入、直接和间接地消耗经济资本(Bourdieu, 1986)。

布迪厄的局限主要在于“在最终的分析中,把每一种类型的资本(当然也包括社会资本)都化约为经济资本,忽略了其他类型资本的独特效用”(Bourdieu, 1986),这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带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的决定论色彩。

(二) 詹姆斯·科尔曼的社会资本功能观

在社会资本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是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按照社会资本的功能,科尔曼把它界定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而是由具有两种特征的多种不同实体构成的,它们全部由社会结构的某个方面组成,它们促进了处在该结构内的个体的某些行动”(Coleman, 1990)。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行动者能否实现某个特定的工具性行动。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并非完全可被替代。为某种行动提供便利条件的特定社会资本,对其他行动可能根本无用,甚至有害。但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之中(Coleman, 1988, 1990)。

科尔曼认为,通过识别社会结构的功能,有助于解释微观现象的差别,又有利于实现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因为社会结构资源与其他资源相结合,导致了宏观水平的不同行为以及微观水平的不同结果。他把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概述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以及权威关系。社会环境的可信任程度,即应尽的义务是否兑现和个人履行义务的范围对义务与期望的实现至关重要。如果某人在社会结构中承担的义务和期望较多,

无论这种义务涉及的资源是什么,此人就拥有较多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理性行动者之所以使他人对自己承担义务,是由于他人能够获得某种超过义务的利益。利用业已存在的社会关系获取信息在为行动提供基础方面非常重要,特别是在获得某些不易通过公开渠道接触的内部信息方面,社会资本更有作用。在集体内部,命令式规范是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本。这类规范要求人们放弃自我利益,依集体利益行动。这类规范总是得到社会的支持而强化。作为社会资本的规范造就了新的民族国家并使众多的家庭得到巩固,还为社会运动的成熟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其他情况下,规范主要靠外部支持即奖励遵守规范者、惩罚越轨者来实现,因此限制了成员的某些行动。当人们意识到解决共同性问题而需要相应的社会资本时,他们会在特定的条件下,把权威赋予某个代理人。如果控制权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可以增加社会资本的总量。上述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都可以通过有意识地创建各种自治组织来形成,从而有助于组织成员实现他们的既定目标(Coleman, 1988, 1990)。

科尔曼还分析了影响社会资本创造、保持和消亡的各种因素:第一,社会网络的封闭性。它保证了相互信任、规范、权威和制裁等的建立和维持。这些团结力可以保证能够动员网络资源。第二,社会结构的稳定性。除了以职位为基础建立的组织外,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都依赖于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社会组织或社会关系的瓦解会使社会资本消亡殆尽。以职位而不是人为结构元素的社会组织的创立,提供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资本,使该社会组织在人员变动的情况下仍能维持稳定;但对于社会资本而言,个人流动将使社会资本赖以存在的相应结构完全消失。第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创造社会资本的途径是把某种要求强加给其信仰者,即要求信仰者按照某种既定的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行动,而不考虑其自身的利益。集体意识形态如宗教的这种作用尤其明显。但是,强调自得其乐,信奉个人独立与自由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则会抑制社会资本的形成。第四,官方认可的富裕及需要的满足。它降低了社会资本的价值,并使已经形成的社会资本无法更新。因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需要相互帮助的人越多,所创造的社会资本的数量越大;而富裕、政府资助等因素使人们相互需要的程度越低,所创造的社会资本就越少。总之,社会资本的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贬值,需要不断更新和增值。无法保持期望与义务关系经久不衰,没有定期的交流,规范也就无法维持(Coleman, 1990)。

科尔曼的局限主要有两点。第一,他对社会资本的界定相当模糊。正如波茨(Alejandro Portes)指出的,他的界定为许多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解释重新贴上社会资本的标签大开方便之门。在社会资本的术语下,既包括

产生社会资本的机制,也包括社会资本的后果,还包括为原因和效果具体化提供背景的“可利用的”社会组织。他并没有区分资源和通过不同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摄取资源的能力。要全面系统地界定这个概念,必须区分:(1) 社会资本的拥有者;(2) 社会资本的来源;(3) 社会资本本身。在科尔曼之后,这三个因素在讨论中经常被混淆,因此带来了这个概念在用法和使用范围上的混乱(Portes, 1998)。第二,他用社会资本的功能为社会资本下定义,在逻辑上混淆了原因和后果。由于后续的许多研究者非批判地接受了科尔曼的定义,因而也重复了他的错误,因此引发了理论性不足、过于简单化和缺乏概念表述的论点,这些至今仍然困扰着社会资本领域的学术研究。众所周知,不同的原因可以导致相同的结果,或者同样的原因在不同的条件下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对各种可能性进行分类需要细致的经验研究。不幸的是,许多研究者都错误地认定,社会资本可以从其结果来界定,或者认为社会资本总是导致“生产性”或积极的后果。这种“功能的”观点暗含着同义反复:当且仅当社会资本发挥效力时,它才能被识别;社会资本的潜在因果解释只有通过其效果才能得出,或一种投资是否依赖于对一种特定行动中的特定个人的回报而显示出来。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研究的大部分工作是开创性的和富有洞察力、启示性的,只是他在概念界定方面的错误需要纠正(Brown, 1999)。

也许出于不能把社会资本与其结果区别开的观点,也许出于他的假定,即作为集体动产的社会资本可以在它的许多不同形式诸如信任、规范、制裁和权威中发现,科尔曼本人也质疑“社会资本是否可以像金融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将成为社会科学中有一个定量概念,这有待于发现;它的当前价值主要在于社会系统中定性分析和运用定性指标进行定量分析的有效性”(Coleman, 1990)。

(三) 亚历詹德罗·波茨对社会资本的系统表述

亚历詹德罗·波茨对社会资本提出了精致和全面的表述。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获取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社会资本是嵌入(embeddedness)的结果”(Portes, 1995)。

借用格兰诺维特(M. Granovetter)的说法(1985),波茨区分了理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理性嵌入即双方对互惠的预期,建立在双方关系取得强迫对方承认的预期能力的基础上。但是,当行动的双方成为更大网络的一部分时(即结构性嵌入),信任就会随着相互期待而增加,更大的社区会强制推

行各种约束因素,波茨称之为“可强制推行的信任”。波茨认为,互惠的期待与可强制推行的信任两者都是借助于对约束因素的恐惧而推行的。通过从由双方约束预期调节的社会联系向由强制推行的信任调节的社会联系的过渡,波茨把社会资本概念从自我中心(ego-center)层次扩展为更宏观的社会结构影响的层次。他区分了另外两种社会资本,即:第一,使价值和规范内化,能够驱使一个人建立社会联系,或者因为一般道德命令而把资源转让给别人;第二,有限团结(bounded solidarity),可以推动一个人建立社会联系,或者因为认同内部人集体的需要和目标而把自身的资源转让给他人(Portes, 1995)。

波茨的社会资本理论其价值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详细阐述了不同自我之间社会联系特征的差异。他把这些差异解释为包含自我在内的社会网络不同特征的结果,解释为嵌入网络的程度或类型的结果。沿着波茨的思路,我们可以把社会资本构想为一个有过程的、自我与社会结构之间因果互惠的能动结果。第二,他区分了社会资本结构化背后的各种不同动因,因而进一步阐明了波茨的单向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使我们可以从自我嵌入的视角出发,用各种不同的动力、动因和社会结构理论系统地阐述社会资本概念(Brown, 1999)。

(四) 罗伯特·D·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的社区观

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D·普特南指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Putnam, 1993)在普特南看来,一个依赖普遍性互惠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更有效率,正像货币交换比以物易物更有效率一样,因为信任为社会生活增添了润滑剂。他还认为,像信任、惯例以及网络这样的社会资本存量有自我强化和积累的倾向。公民参与的网络孕育了一般性交流的牢固准则,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生,这种网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提高声誉,因而也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因为当政治和经济谈判在社会互动的密集网络中进行时,就会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同时,公民参与的网络体现了过去的合作成果,它可以充当未来合作的文化模板。一次成功的合作会建立起联系和信任,这种社会资本的形成有利于未来充分的和连续合作。由于把“我”扩展为“我们”,提高了参与者对集体利益的“兴趣”,互动的密集网络有可能扩大参与者对自我的认识。总之,和常规资本不同的是,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物品”,它不是从中获益的那些人的私有财产。和清洁的空气、安全的街道这些公共物品一样,社会资本不能由私人部门提供。

这意味着社会资本必然是其他社会活动的副产品,并且可以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转移(Putnam, 1993, 1995)。

实际上,普特南把社会资本等同于市镇、都市甚至整个国家这样的社区中的“公民精神”(civicness)的水平。在他看来,社会资本的存量就是一个社区中人们参加、参与社团活动的水平,测量的标准包括阅报、参与志愿组织以及对政治权威的信任表达等等。他用参与投票、家长—教师协会、妇女选民联盟、红十字会、工会、宗教群体、互助及嗜好俱乐部的活动等指标来分析美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模式,得出了美国社会资本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急剧下降的结论(Putnam, 1995)。他有关社会资本正在下降的论著一问世,立即遭到了来自多方的抨击。有批评者指出,普特南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忽略了其他类型的公民行动。比如,人们也许放弃了对妇女选民联盟或家长—教师协会的热情和投入,转而参加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其他活动诸如单身俱乐部、职业培训、社会福利服务、幼儿服务等等;人们也许离开了传统的个人或功利性的公民组织,转而加入了商业组织,像以前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是为了使用体育馆,现在人们则多选择去健身俱乐部;另外,随着以问题为导向的政治运动的增长,人们更经常地参与具体的政治活动和公民活动(如美国面向教育兄弟会、适宜人类栖息组织)。他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跨阶级和组织的动力。实际上,许多公民社团正是由于这种动力而形成、存在和衰落的。他漠视美国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化断裂,这也使他的结论不那么令人信服(Skocpol, 1996)。

波茨指出,虽然上述批评具有合理性,但是并没有解决普特南观点中的致命问题,即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和同义反复。社会资本作为社区和民族的特征,同时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它既可以导致良好的结局,也同样可以引发糟糕的结果。城市和民族—国家的发达与否与社会资本的丰富或匮乏密切相关,这是典型的循环论证。他的社会资本的定義是从结果开始的(这一点有点像科尔曼,他的社会资本的定義就直接来自前者)。波茨告诫社会资本的分析者,要避免同义反复和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必须遵守特定的原则:第一,要在理论和实证上把概念的定義与其结果区别开;第二,要在因果方向性上有所控制,这样可以在论证中使社会资本的存在先于它可能的结果;第三,要控制其他的、可以解释社会资本及其结果的因素;第四,要全面认识社区的社会资本的历史来源(Portes, 1998)。

(五) 罗纳德·博特的“结构洞”社会资本观

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行动者提供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他称之为“朋友、同事以及更一般的熟

人,通过它们获得使用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机会”(Burt, 1992),亦即“结构洞的社会资本”。如果说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等强调紧密联系的网络是社会资本出现的条件,那么博特强调的是相反的情况。在他看来,正是联系的相对缺乏(他称为“结构洞”)推动了个人的流动、信息的获得和资源的摄取。博特指出,从谁“那里”获取资源从属于通过网络结构获取这些资源。由于构成双边关系的个体与大多数类似者共享利益、财富、权力和价值等等,所以自我封闭的网络只能提供重复的资源。网络中的结构洞不仅有更大的获取非重复资源的机会,而且可以为由结构洞连接的一组组结点之间控制资源流动在战略上进行定位,因而他构造了一个有关社会资本系统内各种权力关系的概念框架(Burt, 1992)。

与格兰诺维特相反,博特的创新之处在于他认为重要的因素不是关系的强弱,而是它们在已经建立的关系网络中是重复还是非剩余。他认为社会资本的网络结构受到网络限制、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和网络等级制等因素的影响(Burt, 1992, 1993, 1998)。具体说来:(1) 网络限制与社会资本负相关:围绕某个人而形成的网络限制了中介机会的出现,网络直接或间接地集中在某个单独的人身上;网络限制越多意味着结构洞越少。(2) 网络规模与结构洞的社会资本正相关:在一般情况下,网络规模越大,网络中的成员占有结构洞的机会就越多,因而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在网络规模确定的情况下,网络中非剩余的关系越多,相应的社会资本越丰富。(3) 网络密度与结构洞的社会资本负相关:网络密度越低,网络成员中的结构洞越多,社会资本越丰富;相反,网络密度越高,社会资本越贫乏。(4) 等级制与社会资本负相关,等级制测量的是间接联系集中于一个中心关系人(contact)的程度。集中度越高,社会资本越贫乏。博特(1998)用实证资料对上述四个有关社会资本网络效应的假说进行了验证。

在最近的研究中,博特(1998, 2001)对作为社会资本构成要素的封闭网络和开放网络(即结构洞)进行了概念上的整合和经验验证。博特认为,科尔曼和普特南等所说的封闭或紧密网络强调的是内在的凝聚力,它描述了紧密甚或等级制网络如何降低了与制裁和信任相关的风险,后者与社会资本的使用者的表现相关。而坚持开放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结构洞理论关注的是与某个社会群体之外的人的联系,它解释了机会如何为跨越结构洞的中介人增加价值,这也与社会资本使用者的表现相联系。可以说,博特首次不把开放网络和封闭网络视为对立或竞争的社会资本范式,相反认为它们是相互补充的。一方面,开放网络范式以结构洞的分析为典范,如果联系超越了群体,就会增加群体及其成员的价值;另一方面,当群体内部的资源是充分的且被用于群体或个体成员的获利时,封闭网络也是有效的。相对

于经验论证而言,博特在此所做的理论综合显得有些薄弱。他仅仅认识到中介者跨越结构洞是价值增加的源泉,封闭网络对于实现嵌入在结构洞中的价值是关键的因素。

(六) 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

我们认为,对社会资本概念的表述、指标测量和理论模型的建构做出最大贡献的当属林南。社会资源理论的首倡者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的。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因此,“社会资本可被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涉取或动员的资源。按照这一定义,社会资本的概念包括三种成分: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摄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通过有目的行动中的个人运用或动员这些社会资源。因此可以构想,社会资本包含的三种成分涉及结构和行动:结构的(嵌入性)、机会(可摄取性)和行动导向(运用)方面”(Lin, 1999)。

林南(Lin Nan)把社会资本界定为“在具有期望回报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投资”。这种界定与所有对该讨论做出贡献的学者的各种表述一致(例如: Bourdieu, 1986; Burt, 1992; Coleman, 1988, 1990; Erickson, 1996; Flap, 1991; Lin, 1982; Portes, 1998; Putnam, 1993, 1995)。个人为了创造收益才参与互动和建立网络。他把社会资本的功能概括为四个方面(Lin, 1999, 2001): 第一,促进了信息的流动。通常在不完善的市场条件下,处于某种战略地位或等级位置中的关系人,由于较好地了解市场需求,可以为个人提供以其他方式不易获得的关于机会和选择的有用信息。同样地,这些关系会提醒处在生产或消费市场中的一个组织及其代理人甚至一个社区关于在其他方面未被意识到的个人的可用性和利益。这些信息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使组织招募到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也使个人找到可以使用其资本和提供适当回报的“较好的”组织。第二,社会关系人可以对代理人(如组织的招募者或管理者)施加影响,这些代理人在有关行动者的决定(如雇佣或提升)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某些社会关系,由于其所处的战略位置(如结构洞)和地位(例如权限或监督能力),在组织代理人的决策中也拥有更有价值的资源和行使更大的权力(例如对代理人依赖的极大不平衡)。因此,在关于个人的决策过程中“说一句话”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三,社会关系资源及其被确认的与这个人的关系,也被组织及其代理人视作这个人的社会信任的证明,某些信任反映了个人通过社会网络和关系,他/她的社会资本摄取资源的能力。个人背后的身份通过这些关系为组织及其代理人提供了保证——一个人可以提供超出个体的个人资本的另外资源,某些资源对于组织